

编者按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简称“七普”)数据近日公布,这是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期的一次重大国情国力调查,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这次普查查清了我国人口结构和分布的最新变化,为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人口这一最大国情提供了最基础的信息。

中国人口变化趋势带来的利弊祸福、孰轻孰重该如何辨析、如何权衡?如何从“七普”数据中看到产业和区域就业结构调整的方向,从而为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劳动力供给对我国出口行业的影响有多大?如何深刻认识这些变化对我国服务业和吸引外资带来的机遇?围绕这些问题,本报记者与业内专家进行了探讨,以期能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红利渐退,

外贸高质量发展仍需“人力”博弈

□ 本报记者 刘昕

近年来,零门槛落户、购房租房补贴、人才安置房……为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各省各地发布的措施越来越有分量。一句话,为了“抢人”,政策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因为各省市都清楚,城市之间的竞争最终落脚在人才的博弈上,而这同样也是产业发展的保障。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简称“七普”)数据出炉后,中国现阶段的人口性别比、年龄结构、受教育程度等数值清晰呈现,新的变化与趋势将在制造业用人、劳动密集型产业红利、外贸区域布局等方面带来的影响再度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充裕时代早已结束

“七普”调查数据显示,目前中国人口总数为141178万。其中根据年龄划分,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约有8.9亿人,占到总人口的63%。从总量上看,我国可用劳动力的数量不少,但仔细对照会发现,“七普”15-59岁人口数量所占比重,已经从2010年的70.14%直降到63%。这意味着近10年可用劳动力数量少了4500多万。

即便将数值范围扩大到15-64岁,该年龄段人口比重和规模的峰值水平也分别在2010年(占74.5%)和2013年(达100582万人)之后下降。

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的自然后果是劳动力供给量减少,并导致劳动力市场供给短缺问题日益凸显。外贸企业每年春节过后的招工难问题早已是老生常谈。今年春节后,东莞一些纺织加工企业开出了300-400元的日工资,却仍只能面对等待工人来挑选工厂的被动处境。对于许多外贸工厂老板来说,不愁招不到人年代早已一去不返。

“中国外贸目前35%属于加工贸易,三来一补涵盖纺织、电子信息、机械等行业,这些行业对劳动力要求比较高,受劳动力供给波动的影响也最大。”商务部研究院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平在接受国际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近些年来,无论对于一般贸易还是加工

贸易而言,都普遍存在“技术工人数量严重缺乏、熟练工人不足”的问题。

分析其中原因,张建平认为,这与我国教育结构与资源失衡有很大关系,普通高等教育人才过剩,技术工人供不应求。但与此同时,中高端人才的缺乏已成为第三种短缺,应给予同样重视,“包括职业管理类和技术研发类等,都不能满足中国企业现阶段提升竞争力的现实要求”。

拐点之后如何应对

与2000年至20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0.57%相比,近十年来中国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0.53%,下降0.04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尽管我国人口总数仍在增长,但增长速度不断下降。

此外,出生人口也在不断下降:2020年出生人口规模为1200万,2019年出生人口1467万人,2018年出生人口1527万人,2017年出生人口1728万人……

随着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缩减,劳动力资源丰富时代已经过去,特别是农村新增劳动力数量的减少让城乡劳动力市场经历“刘易斯拐点”。而“人口红利”不再,对中国外贸尤其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对于如何化解并进一步弥补劳动力人口数量下降带来的不利影响,并持续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张建平认为,着眼于我国目前人口结构与人口素质的变化,继续建设贸易强国,必须深入推进自主品牌与自主创新工作,向自主知识产权方向发展,朝着提供附加值更高的产品与服务方向迈进。

“鼓励发展一般贸易并在这个过程中鼓励企业加大研发与创新力度,同时着力培养一批中国的世界知名跨国公司品牌,让我们的外贸从品牌管理、研发设计、市场营销这些全球价值链中的高附加值环节中获得受益,这些都需要相应的人才。”张建平说。

专家表示,事实上,我国从1997年开始就提出“走出去”与“引进来”并重,这其中就与对人口红利不再,企业用地、融资、税费负担、研发成本攀升等因素的综合考量有关。

优化布局得失互倚

“七普”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3.76亿人,比2010年增长了将近70%。从流向看,人口从农村向城市集聚、从内陆地区向东部沿海集聚的总体趋势没有变。从区域格局看,东部地区人口数量为5.64亿人,占39.93%;中部地区3.65亿人,占25.83%;西部地区3.83亿人,占27.12%;东北地区0.99亿人,占6.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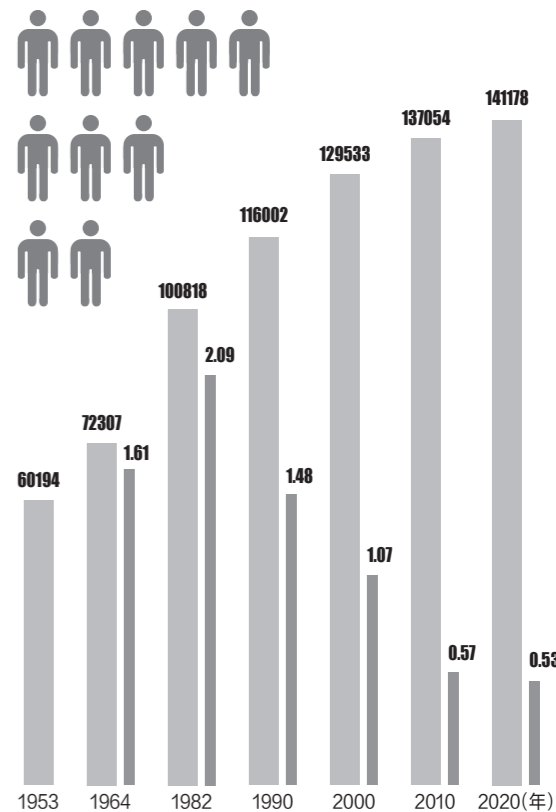
数据反应出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依然是我国人口流入最集中的地区。尽管人口流动活跃,人口集聚效应凸显利好外贸资源丰富地区的劳动力供给,但这是否也一定程度上阻碍或影响了我国外贸区域布局的进一步优化?

对此,张建平表示,的确利弊因素都存在。有利的方面在于人口流动使得集聚效应增强,劳动者有机会选择营商环境、待遇更好的地方工作生活,有利于用市场机制去更好地实现资源配置,让发展效率进一步提升;而不利的地方则体现在,目前来看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对劳动力人才的吸引力仍然持续提升,但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北方省份在人才吸引方面则面临着更大挑战,这对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是不利的。

“所以国家在‘十四五’规划中特别强调改善营商环境、减政放权、重塑政企关系,我们也呼吁通过扩大开放来提升中西部、北方地区的市场化与国际化发展水平。”张建平建议,在这个进程中,希望对人才吸引力相对较弱的地区通过着力改善营商环境,加快企业的集聚与发展,为居民提供更好的待遇与机会,使更多的人才愿意留在故乡与本土发展。

历次人口普查结果

全国人口(万人) 年均增长度(%)



数据来源:东方IC 制图:金静

“七普”数据的发布,再度引发了社会对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影响经济发展的担忧。然而就吸纳就业“蓄水池”的服务业来说,不少经济学家则认为,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显示出,中国正从“人口红利”期向“人才红利”期过渡,这将助推“中国服务”实现高质量发展。

“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社会抚养负担较轻,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

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表示,“我国劳动力资源依然丰富,人口红利继续存在。”

从数量上看,中国仍然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是世界最大的劳动力市场。虽然比2010年减少了4000多万人,8.8亿劳动年龄人口这一数字依然高于全球所有发达国家同口径全部劳动年龄人口的总和。从人口的年龄结构看,虽然低生育和老龄化趋势在加剧,但我国人口平均年龄为38.8岁,依然“年富力强”。

从质量上看,过去1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素质显著提高。普查结果显示,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

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

“中国服务”换道启航

□ 本报记者 孟妮

限为9.91年,比2010年提高0.83年。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口达到3.85亿人,占比为43.79%,比2010年提高了12.8个百分点。大专及以上学历受教育程度的人口占比达到23.61%,也比2010年提高了11.27个百分点。

中国人口素质的提高,在科研产出方面也体现很明显。根据《自然》在2017年的评测,中国科研论文数量加权评分居全球第二,仅落后于美国。今年5月出版的《自然》增刊“2021中国自然指数”也显示,2015年,中国的贡献份额为美国的37%;到2020年已增至69%。在自然指数所追踪的全部四大学科中,中国2018年在化学领域的贡献份额已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最高,在自然指数其他三个学科领域仅次于美国。

相比人口数量,人口素质的高低更关乎经济发展的质量。高素质人口将为社会发展、科技进步、产业升级、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提供强大助力,支撑中国逐步从“人口红利”过渡到“人才红利”。对于服务业而言,人口素质的提高更是其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广泛应用和渗透到各行业各领域,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正在加速形成新的增长点。例如,近年来,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比不断提高已成为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数据显示,今年1-4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增长14.9%,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46.8%,提升4.7个百分点。其中,金融服务、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保险等领域增长较快。这些领域的发展,无一不需要大量的高素质人才。

作为全球第二大接包国,中国在服务外包产业方面也是高素质人才需求“吸纳器”。商务部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我国服务外包累计吸纳从业人员达1326万人,其中大专及以上学历841万人,占63.4%。其中,今年1-5月,服务外包新增从业人员35.3万人,同比增长18.4%,其中大专及以上学历21万人,占60.4%。

正是这些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才,为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参与全球竞争提供了“红利”。即使在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的背景下,中国服务外包依然呈现了快速增长态势。数据显示,今年1-5月,我国企业承接服务外包合同额6491亿元人民币,执行额4069亿元,分别比2019年同期增长34.7%和42.9%。

随着中国人口素质的不断提升,朝着高质量发展方向迈进的“中国服务”机遇仍在。

城镇化水平提高 老龄化程度加深

在中国人口结构变化中探寻外资新机遇

□ 本报记者 晏澜菲

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老龄化程度加深正在成为未来中国社会越来越明显的趋势,这不仅为基础设施建设带来了机遇,也将带动了养老产业的蓬勃发展。深耕中国市场的海外企业势必将从这些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挖掘出新的发展动力。

“七普”数据显示,中国人口从农村向城市集聚、从内陆地区向东部沿海集聚的总体趋势没有变。在这样的人口流动格局下,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2020年人口城镇化率达到了63.89%,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比重上升14.21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上升1.4个百分点。专家分析认为,到2035年,我国城镇化率还将有十几个百分点的提高空间。这将直接带动基础设施建设的市场机会,推动强大城市群在中国的出现。

“基础设施的投资具有放大效应,能够带动GDP增长,增加就业。”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主任张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等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

日趋减弱。同时,以5G、特高压、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为核心的新基建迎合了数字化时代的产业升级需要,有助于培养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成为促进中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必然选择。

她分析称,随着中国城镇化水平的继续提高和产业数字化升级的需求释放,外企有望在基础设施建设、新基建方面获取巨大的市场机遇。“例如,在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5G等方面,外资企业均可以结合我国市场需求以及自身条件积极参与其中,在生产、包装、营销、物流、管理、售后等各个环节中融入‘数字化’和‘智能化’因素,将在竞争中获得有利的地位。”

除了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外,“七普”透露出的中国社会“老龄化”问题也引起高度关注。数据显示,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13.5%,老龄化人口数量呈上升趋势。尽管这一水平目前看与多数发达国家相比并不算高,但已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事实还是说明,在中国,老龄化程度加深已是一个基本趋势。

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表示,人口老

龄化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也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中国的基本国情,既是挑战也存在机遇。人口老龄化将减少劳动力供给数量,增加家庭养老负担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压力,但也会促进“银发经济”发展,扩大老年产品和服务消费,有利于推动技术进步。

在张菲看来,“十四五规划”首次将应对人口老龄化升级到“国家战略”层面,就不难看出养老服务、养老产业将成为一个庞大的需求,并广受关注。“一是老年疗养,包括老年康复医疗,保健医疗,养生保健等;二是老年用品,包括代步车、老年手机、助听器等等;三是老年服务,包括生活料理、养老保险、心理咨询、旅游服务等;四是养老地产,包括养老公寓和养老社区、智慧居家养老等;五是老年文化,包括老年人的教育、娱乐等精神文化生活。未来,上述市场都将给外资带来新的投资机遇。”